

情 感 教 育

——一个青年人的故事

〔法〕 福 楼 拜

冯汉津 陈宗宝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Gustave Flaubert
L'Education sentimentale
Histoire d'un jeune homme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Paris

责任编辑：徐德炎

封面、设计：徐中益

情感教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37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7 $\frac{1}{16}$ 插页7

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72,000

书号 10019·3199

定价 1.70 元

前 言

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去年五月八日是他逝世一百周年,法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学界都有纪念他的学术活动。时隔一个世纪,福楼拜的声誉反而更高了。去年,法国有影响的《文学报》出了纪念福楼拜一百周年的专辑,编者按指出:“福楼拜逝世一百周年了,他无疑是法国不朽的作家之一。其证据就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海外,都发表了大量关于福楼拜的评论。人们对他的作品给以极高评价,并且一致公认:福楼拜把一种崭新的思维方法应用于文学,从而成为现代小说的始祖。从那时起,他便作为一个典范的作家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对福楼拜高度的赞扬,但并非言过其实。

福楼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会与日俱增呢?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他的小说突破了十九世纪的一般写作风格,绽露出二十世纪小说的胚芽。福楼拜小说的“现代性”影响了本世纪几代人的小说创作,这一点已得到文学界的普遍承认。福楼拜小说的现代性究竟是什么,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但我们不妨借用米歇尔·莫尔^①的一段话来作一简约的说明:“福楼拜开创了一种小说文体:在作品中,作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可是没有一个地方看得见他。他避免对人物作出个人的反应,不对人

^① 米歇尔·莫尔(1911生),当代法国作家。

物妄加评论。他这种客观的笔法，在《情感教育》中臻于完美的境地。普鲁斯特对此大加颂扬……正因为如此，福楼拜预告着现代小说的诞生。”^①由此可见，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客观地描写人物和事件，不象十九世纪作家通常所采取的手法那样，在刻画人物时加进主观的色彩，或贬或褒，溢于言表。福楼拜却不这样，他冷静地或甚至无动于衷地表现人物的命运，让人物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个性，独立不羁地思想、处事和找到自己必然的归宿。总之，他给人物的存在以极大的自由，决不对人物的命运横加干预。福楼拜小说的现代性，归根结底就是作家的客观性。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在他所处的时代是过于突进了，未免“曲高和寡”，难得时人的公评，甚至招来了非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时间对福楼拜有利，当代法国文学界把他尊为现代小说的开路先锋，这是他的光荣。当然，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不仅仅由于他写作风格的创新，更由于他作品的现实意义，而这种现实意义又得力于他的写作风格，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福楼拜同十九世纪许多优秀的作家一样，忠实于他的时代，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积弊。斯丹达的小说是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社会光怪陆离的现象；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汇集了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反映了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乔治·桑以对田园生活理想化的描写，来唤起人们对淳朴、自然的社会风气的向往和对资本主义社会陋习的批

① 转引自法国《文学报》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二七三九期。

判；雨果以人道主义作武器，向社会的黑暗势力抗争，并唤醒人们对社会改造应负的神圣使命；莫泊桑出于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深入到法国的各个角落，褒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那么，福楼拜又是怎样来打开人们的心扉，使之领悟到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呢？回答是：否定时代，否定社会！福楼拜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包法利夫人》描写了外省的一个普通女子爱玛对庸碌麻木的丈夫的不满，向往浪漫主义作品中描写的爱情生活，然而客观环境是一个庸俗可怕的拜金主义社会，她的理想追求在实践中只能演化为放荡和堕落，最后招致她的毁灭。《情感教育》描写一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弗雷德里克在社会上到处碰壁，终于老之将至，一事无成，不堪回首。而另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戴洛立叶也殊途同归，空自悲戚。福楼拜花了生命中最后八年的精力而尚未完稿的《布瓦尔和佩居谢》，描写了两个对生活、对知识有着热烈追求的誊写员，但他们却处处遭到生活的嘲弄，碰得头破血流，终于失掉生活的勇气，痛苦地怀疑人生的意义。这一幅幅的人生惨败图说明了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吗？不是，福楼拜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资产阶级社会。他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我‘对人生缺乏一种明确和广大的视野’。您一千次对，可是在有什么方法改一个样子呢？我请教您。”^①福楼拜和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坦率承认自己的缺点，但这种缺点或无能不应由个人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具有普遍的社会性，正象赌博是社会的产物一样。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楼拜给科莱^②的信中说：“就在此刻，我相信我可怜的包

① 见《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11—1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② 路易丝·科莱(1816—1876)，法国女作家。

法利夫人正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受苦，哭泣。”显然，福楼拜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失败的境地，是社会现实逼迫他非如下笔不可。因此，一个真理昭明了：一连串个人失败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失败。我们在上面说过，福楼拜冷面铁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原来他是在冷面铁心地对待不公正的社会。于是，那个对人物的短长不置可否的福楼拜，终于对社会发了言，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福楼拜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就是福楼拜。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界给予福楼拜如此崇高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福楼拜写作极其严谨，对作品精雕细琢，甚至达到自我挑剔的地步。他每天写作七八个小时，一个月才写二十来页稿子，稍不满意即悉数付丙。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7）、《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三故事》（1877）以及《布瓦尔和佩居榭》（1881）。以前通常都把《包法利夫人》当成他的代表作，但是也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如当代作家努里西埃^①就说过：“我无法在《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非选不可，那我无疑将会选《情感教育》。”^②这说明现今的作家和读者对小说的鉴赏标准和文学趣味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从前写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现在却讲究情节的

① 弗朗索瓦·努里西埃（1927生），当代法国作家，费古尔学院院士。

② 转引自《文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二七三九期。

真实自然和反映生活的深度。从文学是社会的镜子这个角度来说，《情感教育》无疑是在《包法利夫人》之上的。当代法国文学评论家让·马利尼翁所著的《法国作家词典》也把《情感教育》作为福楼拜的代表作。

《情感教育》有两个不同的文本。第一个文本写于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五年间，描写两个青年的遭遇。第二个文本写于一八六七年，故事情节与结构跟第一个文本截然不同。通常所说的《情感教育》指的是第二个文本，副题是《一个青年的故事》，这个青年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作者着力刻画了弗雷德里克由青年到中年的个人际遇，他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既没有事业上的成功，又没有爱情上的结果，惟有“徒悲伤”而已。弗雷德里克出身于外省一个靠地租收入维持家计的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毕业后去巴黎上大学法科学习。有一次他在船上与画商阿尔努夫妇邂逅，便对阿尔努太太一见钟情，回巴黎后想方设法跟她交往。嗣后他又认识了妓女萝莎妮，从此他就陷入双重的爱情不能自拔，学业荒废了，情操低下了。他有得天独厚的资质，并抱着种种美好的憧憬，既想当哲学家，又想当文学家和画家，甚至在朋友们的撺掇下，他还异想天开地要去竞选议员。最后，这一切全成了泡影。福楼拜笔下的弗雷德里克，是一个“集一切弱点之大成”的人，做任何事只有五分钟热度，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便垂头丧气，从来不能坚持到底。他每天都许愿要坚强起来，要奋发有为，但睡了一觉便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他每天早晨都抱着一个理想，一到晚上便烟消云散。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怎能成大事呢？就连他在情场的遭遇也如此。他爱过四个女人：一个是资产阶级贤妻良母的典型阿尔努太太，一个是风流淫荡的萝莎妮，一个是天真烂漫的乡下姑娘路易丝，

还有一个是大银行家唐布罗士的妻子。他怀着崇敬和真挚的感情去爱女资产者，出于玩弄的欲念去爱烟花女，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去爱怪僻的少女，为满足向上爬的虚荣心而去爱朱门贵妇。在以上四个女人中，他只对阿尔努太太怀有真爱。可是，他在爱情上就象在事业上一样软弱无能，这个感情脆弱的男子竟然不敢表白自己的爱情。他刚健不足，阴柔有余，到头来所有的爱情都离他而去，终至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福楼拜所塑造的这个资产阶级浪子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这是资产阶级中的无为者的化身。乔治·桑曾经责备福楼拜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如此悲惨的结局。然而这正是福楼拜现实主义手法的可取之处，他只是忠实地反映了一个严肃的社会现实问题。书中着墨较多的另一个青年戴洛立叶是与弗雷德里克有着迥然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福楼拜想把戴洛立叶写成弗雷德里克的对立面：意志坚强，野心勃勃，刚愎自用，寡廉鲜耻。法盖说他“有点象一八四〇年的「达·索黑尔」”。他为了向上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忽儿是共和党人，一忽儿又是社会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来捞到一个外省委员的官职。但是保王党人向他开枪，社会主义者要吊死他，六月革命后他被政府革职了，到头来依然名利两空。他与弗雷德里克走着不同的道路，但却在同一点上会合，就是两人都虚度了年华，都遭到了失败。作者描写了两个出身、性格、职业、经历全然不同的青年，显然为了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个人的失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我们在《情感教育》中找到了依据。当弗雷德里克和戴洛立叶这两个自幼以来的契友一起总结各自在人生道路上

① 埃米尔·法盖(1847—1916)是法国文学评论家。这段话引自他所著《福楼拜》一书。

惨败的教训时，作者说：“他们责怪机缘、环境以及自己出生的时代。”^①把个人的失败归结为时代的过错，这是福楼拜很高明的一着，这大概也就是他要叙述“一个青年人的故事”的用心所在了。

《情感教育》极其可贵的一点是描写了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七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特别是一八四八年革命贯穿其中，展现出一幅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瑰丽宏伟的社会画面。作者把主人公的命运与社会事件糅合在一起，显示了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其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社会现实。福楼拜也不例外。他的政治见解是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复合体。他于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给乔治·桑的信中说过：“我看不见在今天建立一种新原则的方法，也看不见尊重旧原则的方法。所以我寻找那应当是一切所从属的观念，不过没有找到。”^②他对政治斗争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恶感与无名之火，对保王党、共和党和社会主义者一概痛诋。他于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③的信中说：“正因为我相信人类永恒的进化及其无穷的形态，所以我恨所有的框框，有人却拼命把这些形态装进框框里去；所以我恨所有限制人类进化形态的公式，所有为它想出来的计划。奴隶制度不是它最后的形式，封建制度更不是，君主政体更不是，就是民主政体也不见得。人的眼睛所能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因为在这天边以外还有别的天边，这样以至于无穷。所以寻求最好的宗教

① 见本书第五三三页。

② 《西方文论选》下卷第二二二页

③ 尚特比（1800—1883）是包法利夫人一书的译者，她写信给作者，祝贺小说的成功。福楼拜曾与她通信，谈自己的文艺观点。

或者最好的政府，我认为是一种极为愚蠢的措举。”福楼拜反对观念、主义和党派的思想，必然或明或暗地反映到小说中来，例如他在《情感教育》中写道：“而比这些更厉害的是，还跑出一个社会主义来！虽然这些象耍骰子一样新奇的理论，已经足足辩论了四十年，把图书馆也填得满满的，使得资产阶级惶惶不可终日，就象一阵密密麻麻的殒石雨落到他们身上一样。大家怒发冲冠，因为一切观念（正唯其是观念）的光临都会煽起仇恨；观念先遭到别人的憎恶，之后就因而得到了名声，并且不管它怎样平庸无奇，总要把它的敌人踩在脚底下。”^①这一席话完全代表了福楼拜的政治见解。与他反对“观念”的思想相联系的是他对革命的怀疑，他认为革命只带来破坏，于社会毫无好处，革命的结果只是一个政府更迭另一个政府而已。这些无疑是福楼拜思想中的糟粕。福楼拜对资产阶级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平庸之辈，他们不懂法兰西的文化传统，与神圣的文学艺术无缘。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见解未免偏颇，这是福楼拜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

可是，也不能否认，他对下层人民基本上是同情的，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领袖如巴尔贝等人怀有敬意。这些，我们在《情感教育》中不难看出。作者用广角镜头摄取了这次革命的许多珍贵画面，有的画面十分壮丽奇瑰，表现了从群众深处突出出来的革命蛮力和沸腾的激情，各阶层人民对革命的态度，政府军对革命群众惨无人道的杀戮，以及革命失败后不同阶级的鲜明反应。作者以冷峻而微暗的色调勾勒出一群借革命之机追求各自利益的人物的形象，具有历史的实感和艺术魅力，却也隐约透露出潜

^① 见本书第三七三页。

藏于画屏后面的作者的爱憎。福楼拜在鞭挞保王党人和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始终没有捐弃对革命群众的偏见，他否定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他还追求一种纯客观的艺术效果，有时给无产者的脸上抹一道滑稽、丑恶的油彩，这也是作者在小说中留下的晦暗的思想烙印。

福楼拜对革命和人民群众既然有这些不正确的看法，为什么《情感教育》关于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描写却能反映出不少正确而又符合历史真实性的观点呢？为什么对金融贵族唐布罗士的揭露是那样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呢？为什么店员杜萨迪埃又那么富于无产阶级本色呢？我们知道，福楼拜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善于细致地观察事物，在写作过程中追求客观的效果，追求艺术真实。他曾经说过：“依我看，小说应当科学化。”^①他认为写小说应当象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实事求是，使人物和事件具有如现实中一样的真实感。福楼拜写作态度非常严肃，他为了描写一八四八年革命而查阅了大量的书报杂志和其他资料，看了许多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小说中的事件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甚至连一个细节都不马虎从事。例如小说中描写弗雷德利克在革命期间的所见所闻，作者力求真实。他在给挚友儒勒·杜普朗的信中说：“你是不是记得巡回医院的情况？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星期巴黎夜晚的一些情景，请写信告诉我。我的主人公在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晚上（最后一个夜晚，因为到二十六日就一切都结束了）游荡在巴黎街头。”^②福楼拜科学而缜密的写作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唯其如此，他的小说就获得了巨大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贯穿在作品中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发展

① 福楼拜于一八六七年二月致马里古尔信。

② 福楼拜《通信集》第五卷第四一〇页。

的脉络是清楚的，基本史实是客观的，甚至某些无名战士的形象也栩栩如生，即使今天看来，仍有艺术魅力。整部作品的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情感教育》问世后，曾在法国文坛引起争论。有的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平庸之作，与《包法利夫人》相比显得惨白；有人批评这部小说结构平板，情节单调，气氛沉闷，或者说作者对主人公太冷漠；也有人认为小说只鞭挞了过去，而没有指出未来。但是这部作品却得到了波德莱尔、左拉、乔治·桑、莫泊桑、龚古尔兄弟、普鲁斯特等著名作家的高度评价。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乔治·桑在《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情感教育》的评论，其中写道：“我们不可能要求艺术家叙述未来，但是我们会感谢他用坚定的手法去批判过去。……幽默的、讥讽的、严肃的和深沉的作家，你的书证明了什么呢？——你不必说，我也知道，我看得清楚。它证明了，这种社会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必须彻底改变它。你的书证明得多好啊！要是你说出与此相反的话，人们也许就不会相信你了！”乔治·桑的这段评语是十分中肯的。显然，主张小说科学化的福楼拜绝对不会违背作家的良心，脱离现实，去迎合当权者的雅趣，在小说中抹上粉红的底色。

最后，我们想引述当代作家梅尔勒^①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从灵感上看，《情感教育》无疑是福楼拜所写的最现代化的小说。在他那个时代，他表现人物的手法是极其先进的。……因此，这本十九世纪的小说已经宣告了二十世纪小说的诞生。”^②

译者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南京

① 罗贝尔·梅尔勒(1908生)，当代法国作家。

② 转引自《文学报》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二七三九期。

第一部

—

一八四〇年九月十五日凌晨六点左右，停靠在圣贝尔纳码头的蒙特罗城号轮船即将启程，烟囱里冒着滚滚的浓烟。

乘客气喘吁吁地赶来。地上摆满了大桶、缆索、装衣服的篮子，路都被阻塞了。水手任凭大家喊叫，对谁都不答理。你推我挤，大家互相碰撞。旅客的行李高高堆在两个绞车卷筒之间。从金属板炉栅里冒出来的水蒸汽，把一切东西都蒙上一层淡淡的雾霭，隆隆的响声盖过了人群的喧嚣。同时，船头的大钟不停地响着。

轮船终于启航了。即刻，商店、船坞、工厂林立的两岸，宛如舒展开来的两条宽大彩带，向后飘忽而去。

有位十八岁长头发的青年，胳膊下面夹着一本画册，一动也不动地待在舵旁。他透过雾霭，凝视着那一幢幢不知名字的钟楼和大厦。随后，他向圣路易岛、巴黎旧城和圣母院环视了最后一眼。不一会儿，巴黎消失了；他长叹了一口气。

弗雷德利克·莫罗先生，新近从中学毕业，在攻读法科之前，回塞纳河畔的诺让城省亲，将在家乡消磨两个月的假期。在他返里之先，他母亲给了必要的盘费，打发他到勒阿弗尔城去探望他的叔叔，指望将来他的叔叔能把遗产传给她的儿子。莫罗先生前一天才从勒阿弗尔城归来，他特地选了一条最远的路程返回故里，以弥补他未能在京城逗留之缺憾。

喧闹声渐渐平静下来。大家都坐到各自的舱位上。有几个

法利夫人正在法国二十个村庄里受苦，哭泣。”显然，福楼拜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失败的境地，是现实逼迫他非如此下笔不可。因此，一个真理昭明了：一连串个人失败的总和就是社会的失败。我们在上面说过，福楼拜冷面铁心地对待自己的人物，原来他是在冷面铁心地对待不公正的社会。于是，那个对人物的短长不置可否的福楼拜，终于对社会发了言，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福楼拜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就是福楼拜。二十世纪的法国文学界给予福楼拜如此崇高的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福楼拜写作极其严谨，对作品精雕细琢，甚至达到自我挑剔的地步。他每天写作七八个小时，一个月才写二十来页稿子，稍不满意即悉数付丙。因此，他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的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7）、《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三故事》（1877）以及《布瓦尔和佩居榭》（1881）。以前通常都把《包法利夫人》当成他的代表作，但是也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如当代作家努里西埃^①就说过：“我无法在《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之间作出选择。如果非选不可，那我无疑将会选《情感教育》。”^②这说明现今的作家和读者对小说的鉴赏标准和文学趣味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从前写小说讲究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现在却讲究情节的

① 弗朗索瓦·努里西埃（1927生），当代法国作家，龚古尔学院院士。

② 转引自《文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二七三九期。

牛皮做的模样奇怪的红靴，靴上有着蓝色突纹图案。

他并没有因弗雷德利克的出现而受惊扰。他几次转过身来向弗雷德利克连连眨眼，象是诘问他来做什么。接着，他向周围的人都献上雪茄烟。不用说，这群人叫他腻烦了，他走到稍远的地方去。弗雷德利克也跟着过去。

起先，两人谈论各种各样的烟草，随后话题一转，自然而然地扯到了女人身上。这位穿红皮靴的先生帮助弗雷德利克出了不少主意。他大谈理论，叙述逸事，甚至以现身说法，引自己为例，他在详述这一切时语气温和，带有一种放荡的天真，叫人感到畅快。

他是共和党人。早先出门远游，深谙戏院、餐馆和报社的内幕，认识所有著名的艺术家，亲热地称呼他们的小名。弗雷德利克随即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他表示赞许。

不过，他忽然中断谈话而去观察烟囱管。他口中念念有词，计算了许久，想要弄清楚“活塞每分钟抽动多少次，每次多少时间……等等”——一到数目算出来，便又尽情地称赞起沿途的风景。他说自己能摆脱事务羁绊，感到很高兴。

弗雷德利克对他怀有三分敬意，忍不住想问他的尊姓大名。这个陌生人一口气回答道：

“雅克·阿尔努，工艺社的老板，家住蒙马尔特大街。”

一个戴着绣有一道金线鸭舌帽的仆人过来向他说：

“先生可以下去一下吗？小姐哭了。”

他走了。

工艺社是一家兼管两种业务的商号，包括一家画报社和一家画店。在家乡书摊的大广告牌上，弗雷德利克不止一次看到过这个商号，上面神气十足地横书“雅克·阿尔努”这名字。